香港新一届政府，急切需要政治人才

原创 简思智库 [简思智库](javascript:void(0);)

**简思智库**

微信号 GNSSTT

功能介绍 策者简也，思而后行。

2022-03-29[原文](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?__biz=MzUyNzQyMzYwNQ==&mid=2247491213&idx=1&sn=30317885fef87fb9da3dccd69208fd78&chksm=fa7e9f97cd09168120a32972bf65c917590415d097d46e1f19bb3a53ab7c137f9c4e3d2ca4b8&scene=27#wechat_redirect&cpage=288) 发表于

收录于合集



点击蓝字关注我们



特约作者：方舟

**简思智库有话说：**

“爱国者治港”原则已十分明确，但纯粹符合“爱国者”的基本条件，并不完全等同有能力“治港”，政治人才的信念、能力、才干、意志、号召力，同样重要。

**第五波疫情，敲响了香港“管治”问题的警钟。**

港府的处理手法和执行能力，充分暴露了在管治效能上的弱点，特别是政府在突破常规运作、应对危机的能力上有很大的改进空间。

**随着新一届政府的重组，下一步必然是提高特区政府的管治效能、完善香港特区治理体系。**



1







管治效能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环境有很大关系，香港亦非例外。

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，包括北京和香港商界人士都经常把香港视为一个“经济城市”，而不是一个“政治城市”。

然而，1984年签订《中英联合声明》后，英国人面对1997年后政权必须移交中方的事实，便刻意在所谓“民主化”的旗帜下，大幅度推动政治开放和下放政治权力，导致香港的政治环境出现实质性转变，其后果在回归以后各种大大小小的政治事件中显然易见——香港显现不再是一个简单的“经济城市”。

在此客观社会政治条件的变化之下，尤其在回归之后对港府管治效能的要求，与1980年代中期之前完全不一样。

但政府施政模式未能适应转变后的政治环境，以理性决策模式为圭臬的技术性公共政策制定，并不足以成为任何意识形态下良政善治的充分条件。

除了行政管理专才之外，政府必须拥有能够驾驭复杂政治环境的政治人才，才能有效领导政府、落实施政。

**这次疫情正正暴露出上述问题，特区政府官员虽有行政能力，但却缺乏足够的政治决断和应变能力。**

香港的公务员均以行政管理人员的模式进行培训和提拔，而事实上绝大部分的公务员（不论职系）均有专业、廉洁、高效的优点，作为行政管理人员表现出色，绝对是在香港治理体系中重要的资产。

然而，政治人才与行政管理专才并非同义词，其培养和选拔过程更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。

**行政管理专才的角色在于管理和调动政府系统内的资源，其特点是按既定程序办事，有条不紊处理各种繁复的公文；因此，“行政管理”的专业性比较突出。**

**然而，政治人才在思考和处理管治问题的时候，则需要从一定高度的战略视角出发，需要有“干成事”的真本领。**

全国政协副主席、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去年7月已对香港的管治者提出明确的五点要求，包括：

1. 在治港实践中全面准确贯彻“一国两制”方针；
2. 善于破解香港发展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；
3. 善于为民众办实事；
4. 善于团结方方面面的力量；
5. 以及做履职尽责和有责任心的爱国者。

当中，尤其是对特别行政区管治者政治素质和政治才干的要求，恐怕不是一般的行政管理人才可以满足和胜任。

2







对政治人才和行政管理专才的要求不同，其历练过程（尤其当中需要克服的挑战）也不一样。

承袭英国体制，香港有一套比较系统化的行政人才培养机制，但回归25年来，香港始终没有发展出一套培养政治人才的机制。

虽然香港也曾经出现一些比较出色的政治人才，但整体人数不多，他们的成功带有颇多的个人因素，并非一个梯队性人才培养系统的产物。

内地的组织系统有一套非常严密的政治人才培养体系，近年亦非常强调干部要“从基层做起”，经过多个岗位历练才一步一步走向领导职位。

同样，西方国家的政治人才培养也有其一套体系，注重政治人才的层层历练。

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为例，他从政近30年时间，开始由一位助理国务卿（欧洲及加拿大事务）特别助理做起，1994年进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，曾任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、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、总统特别助理兼高级总监（分别负责写作演讲稿、战略规划、欧洲事务）。

2002年后历任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民主党幕僚长、副国务卿，拜登任总统后就任美国务卿。

值得留意的是，布林肯过去三十多年的政治历练，全部来自全职的政治委任岗位，并非以顾问身份兼任的社会公职。

政治人才择优而仕，需要完整的培养体系和明确的晋升阶梯。

2000年后香港引入“主要官员问责制”，其最大作用是扩大可协助行政长官施政的政治委任官员岗位，长远为香港培养政治人才。

然而，“问责制”的名字让大家错将重点放在官员“犯错则应下台”，而忽略政治委任制度在培养政治人才方面的作用。

在目前的制度设计下，香港的政治团队层级较为单薄、职位功能比较狭窄、晋升梯级和渠道不明确、亦缺乏足够的人才储备。

在未来，提升特区政府管治效能必须重点关注“爱国者”政治人才的培养，建设系统化、梯队式的培养体系。

“爱国者治港”原则已十分明确，但纯粹符合“爱国者”的基本条件，并不完全等同有能力“治港”，政治人才的信念、能力、才干、意志、号召力，同样重要。

此次疫情造成的社会成本令人十分心痛，毋须赘述。

**只希望疫情能够成为一股催化剂，让大家可以从各种社会机制失效中看到香港治理体系的核心问题，真正明白提升香港管治效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。**

若此形成共识，也算是疫情为我们带来一丝安慰，香港真正由“大乱”走向“大治”。

**不念过去**

**END**

**不畏将来**



方舟，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研究总监。

欢迎您投稿原创文章到简思智库，让您的声音被更多人听到



请长按下方二维码添加简思智库工作微信投稿。（或搜索添加微信ID：**GTT\_CN**）









**感谢阅读，请关注我们，或点右下角“赞”和“在看”分享。**



### 精选留言

用户设置不下载评论